

汪精衛的一生(三)

費雲文

利用胡漢民事件乘機再起

蔣主席救平了全國各地反叛中央的動亂以後，爲了迅速而真正的開始訓政，從事國家建設；以期早日過渡到憲政時期，選政於民，實行民主政治。特別寬大的採取特赦一再反覆的北方軍政領袖和一般政客的立場，並且容納若干國策意見；而提出一個五點計劃：

- (一)完全根絕共產主義與共匪。
- (二)整理全國財政。
- (三)發展廉潔而有效的國家行政。
- (四)發展全國經濟。

(五)發展各省縣地方自治；交由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討論通過，作爲召開全國國民會議的準備。召開全國性「國民會議」，本是國父中山先生多年奮鬥的目標，在其遺囑中曾有：「務期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昭示；而實施訓政，制

定約法，也是當時必不可緩的大事。蔣主席此一舉措，雖爲各方所接受；可是却爲始終和他立場一致的胡漢民所堅決反對。

胡主張在訓政時期，由國民黨負責，以黨治國；而反對蔣主席的做法（包括擴大政府基礎）。但胡與其同僚熱烈辯論後，大多數同仁贊成蔣主席的主張；於是他即自行辭去立法院院長的職務。

監察院因爲胡阻撓「國民會議」，反對約法；於是對胡提出彈劾。蔣主席鑒於年來國內叛亂頻仍，大都以某一衝突事件爲藉口，以致稱兵犯上，兵連禍結；惟恐再有人以此假借胡的名義，興風作浪，滋事生非。所以他希望胡能暫留首都。然而外人不明真相，再加失意政客的藉機挑撥；於是有些一向和胡較爲接近的黨內同志，對胡的辭職和留京；誤解係受到壓力，受到限制。

民國廿年五月五日，全國性「國民會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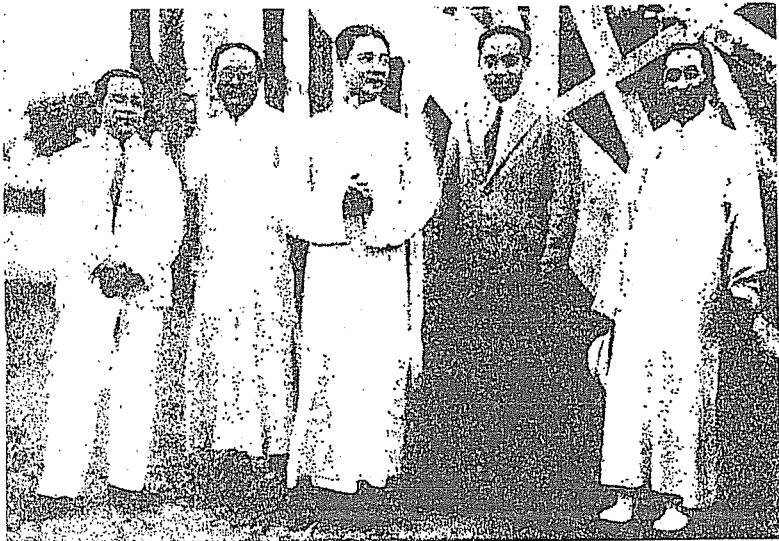
南京召開，出席代表四百四十七人，包括國民黨、農會、工會、商會、工業團體、教育會、大學校、自由職業、以及蒙古、新疆、海外華僑等代表；就面對的國家重大問題鄭重討論，通過要素多起，並且通過「訓政時期臨時約法」；規定人民在訓政時期應受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種政權訓練，保證人民有集會、出版、與言論的自由，保障私有財產的權利。

「臨時約法」的通過與實施，可使人民於執行政權以前，對於民主的要素，得到廣泛的經驗；可使中國，由一黨政治過渡到民主與自治的地位；這正是國民革命以來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如果全國上下團結一致的順利貫徹實施；那麼預料到民國廿四年，各地的地方自治，至少有半數省份以上可以完成；就可以開始準備實行憲政了。

可惜，「國民會議」所預定的進展程序，和

這千載一時的建設機會，却因為新來的內叛，和外來的侵略，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新來的內叛，起自南方，廣東陳濟棠受到古應芬的游說，以胡漢民事件為藉口，在廣州發難，驅逐省主席陳銘樞，自兼省主席。汪精衛見有



民國二十年汪精衛（中）自歐洲返國時與歡迎人合影。

機可乘，又回到廣州，鼓動過去反中央的南方人士，結合粵、桂、胡、汪各系，再成「反蔣」之局。當組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廣州為基地，成立名義上獨立的南方「國民政府」；由汪精衛、唐紹儀、陳友仁等領銜發出通電，要求蔣主席下野；陳濟棠且已組織「北伐軍」，公開準備戰爭。

另一方面，共匪自民國十六年被排出國民黨後，即以「蘇維埃路線」的赤裸面目與羣衆相見；截至當時，武裝活動已遍及湘、贛、粵、桂、閩、皖、豫八省，建立十五個游擊區，形成足以燎原的情勢。

當此國內問題嚴重之時，日軍又發動「九一八」事變，出兵竊佔我東北四省。蔣主席處此內憂外患之際，對外立即籲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對內則對南方呼籲和平，特派代表赴粵，促進團結。可是，南方（尤其胡漢民）却堅決以蔣主席下野為先決條件。蔣主席當然不願以個人的去留，影響到整個的和諧團結，乃于十二月十五日辭去政府一切職務，返回奉化。

這時，汪又在上海舉行選舉會，產生一批「改組派」的「中央委員」，乘機要求納入中央黨部，以為和平條件之一。

民國廿一年元旦，國民政府改組，以林森代理主席，孫科、陳銘樞為行政院正副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蔣公、胡漢民、汪精衛為國民黨中政會三常委，指導與決定國策。但胡已去港，蔣公已返奉化。

政府改組，由於蔣公離職，失去重心，基礎

極不穩固；而軍事、經濟，問題也很多；各地民衆，人心惶惶。國難時艱，有識之士，都以為非請蔣主席復膺政府大任，不足以言救國。中央政治會議乃開緊急會議，敦請蔣公返京共商大計。於是，汪精衛「倒蔣」、「反蔣」，又去杭州「迎蔣」，連名促請胡漢民入京，共商國是，胡不應。而日軍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因此，蔣公不得不再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負責救國；而汪也如願以償的出任行政院長；演變成「蔣汪合作」之局。

「屈辱外交」焦頭爛額

汪出任行政院長，自居為責任內閣，對地方的外交方針也欲親自面授機宜，因此，在北平與張學良發生誤會。汪以為張祇知服從軍令而藐視行政院長的職權，甚至避不見面；是對他個人的莫大侮辱。於是利用國人對張放棄守土的惡感，通電痛責張；並採取他一貫憤然出走的作風，于八月一日出走上海，通電辭行政院長職務，促張也同時下野，以謝國人。

汪的這封通電，說得冠冕堂皇，張不得不同時辭去「華北綏靖公署」主任的職務。可是，日軍侵犯未已，中央對北方軍事，尚來不及作大幅度調查；於是，再在北平成立軍事委員會分會，任張為代理委員長，仍統率東北軍，暫維大局。汪以為其面難下，乃于十月廿二日又負氣放洋德國，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

民國廿二年二月，熱河戰爭又起，湯玉麟不戰而逃，日軍進攻長城各口，威脅平津，三月，

蔣委員長親自北上，部署抗日戰事，下令以軍政部長何應欽接替張學良，指揮長城抗戰軍事。汪精衛在德國寂寞無聊，也自覺前次因不忍小忿而放棄大權之非；乃又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為由，返回國門，假裝堅請開除行政院長本缺，願以黨員與國民身份盡瘁國是。結果，當然得到慰留；不但復任行政院長，而且兼任外交部長。北方的戰爭，相當激烈，國軍堅強抵抗，予日軍重創；政務方面，成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黃郛為委員長，替汪負緩衝之責；因此，才有五月卅日瀋沽停戰協定的簽訂，華北暫保一時的平靜。

但自是年八月宋子文美棉借款成功，在倫敦簽訂白銀協定，並與國聯成立技術合作以來；引起日本的不滿。公然採蠻橫無理的干涉政策，宣稱：「日本堅決反對中國與國聯合作，因日本在亞洲負有特殊之使命；凡與中國有關之事，日本與各國的意見不盡相同。故中日應直接交涉，反對列強干涉」。

汪此次就任行政院長，曾自命為「跳火坑」，並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說。由於其不夠堅定的特性，對日本層出不窮的無理要求，難免有過於牽就之病。民國廿四年元旦發表的「救亡圖存方針」，二月十三日的「取締排貨令」，以及六月十日的「睦鄰令」；甚至根據日方建議，修改教科書，取締宣傳及教育的排日思想。都被各方指斥他所主持的是「屈辱外交」，使他感到焦頭爛額。

多年來，汪利用兩廣與中央的矛盾，挑撥播

弄，各要員忽進忽退，退而復進，大都仍能保持相當權位，（胡漢民自甘淡泊，張發奎下野出國，又當別論）惟有過去掌握軍權曾任方面的李濟，陳銘樞失勢失所，雖然他們曾于上年年初，在福建與舊部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等發動一次政變，企圖聯合盤據江西的共匪，另創天下；但迅即被中央救平，他們反省痛恨之餘，亟欲再掀政潮，而尤以先殺專利用別人的汪精衛為快意。於是貫通職業凶手，于廿四年十一月一日，乘汪出席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中央黨部前集體照相時，行刺暗殺。

當時變起倉卒，汪被擊中受傷倒地。陳璧君及改組派人物。一向對中央成見很深；因而多方揣測，陳且口出惡言，懷疑係蔣公授意。可是凶手孫鳳鳴當場死亡，無法查究何人主使，難明真相。幸而戴雨農由凶手所假借的晨光通訊社，查出線索，知道凶手的同黨要犯余立奎等已逃匿香港；於是戴排除萬難，派員赴香港，將余立奎等引渡回國法辦；據供稱係李濟、陳銘樞所主使，王亞樵所僱用，一場誤解，才告消除。

汪既受傷住院，不得不辭去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六中全會乃改推胡漢民為中常會主席，汪為中政會主席；蔣公為此二會之副主席，並兼行政院長，張羣為外交部長。

民國廿五年二月十九日，汪又飄然出國。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汪認為是他個人重握政權的大好時機；於是「以急公赴難」為由，不俟召而歸。可是，當他乘程趕抵上海時；西安事變已結束。他即發表言論，反對「

人民陣線」，反對「假民主主義之名而圖分裂中國」；完全站在極右端的立場，和武漢時代判若兩人。

低調反戰、潛逃投敵

民國廿六年，由於日軍漫無止境的侵略，中日雙方的若干問題，已無法循外交途徑獲得解決；而國內上下，也都激於憤慨，不惜一戰：「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歌聲，到處傳遍。因此，蘆溝橋事件，一觸即發，全面抗戰，從此開始。「八一三」滬戰爆發後，中央組織「國防最高會議」，以為國家決策機構，蔣公及汪，分任正副主席。但，汪實際上是主和的，對抗戰前途，並無信心；祇是限於當時客觀形勢，無法說出也無法實現他的主張而已。

南京淪陷前後，德國大使陶德曼曾經出面調停和平。但由於日軍的條件太苛，且堅持談判時不停戰；所以我國未予接受。為表示長期抗戰的決心，政府宣言遷都重慶，蔣公專心軍事，行政院長兼職改由孔祥熙繼任。

日軍既未能速戰速決，又無法以勝逼和；惱羞成怒之餘，乃于民國廿七年一月十六日發表不以蔣公主持的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而希望引誘我國因和戰問題，演成分裂狀態，有人出面自動推翻蔣公，代表政府，與謀和議。

汪以孔既接行政院長，自己再無重作馮婦的之望；再因戰局的不利，以為不可能反敗為勝，於是，他對個人和國家的前途，都抱悲觀的看法。自日本近衛首相宣佈不以蔣公為交涉對象後

，他又犯了覬覦多變的老毛病；與一般失敗主義者周佛海、高宗武等往來甚密，當時，一般人士，以彼等言論消極，稱之為「低調俱樂部。」

雖說，自是年三月至七月，汪已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以及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要職，足以發揮其個人才能，報効國家，然而，汪的「惟一領袖」私慾，始終作祟。不但暗中利用高宗武、梅思平之流，與日本勾結；甚至不惜公開大倡其「反戰論」的低調。

是年十月間，正當武漢會戰緊張時期；汪居然對海通社的記者公開談話：「中國在抵抗侵略時期，初未關閉第三國調停之門；但和平能否成功，需以日本和平提議之內容為斷」。此論引起各方怒斥：「主和者就是漢奸，想做漢奸的滾出去！」

不久，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汪訪蔣公談至深夜，以為抗戰前途，必敗無疑；而力主即與日本謀和，未為蔣公接受。十一月三日，蔣公再繼「為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之後，發表演說，聲明：「今後只要國民團結抗戰，日本進攻，毫不足懼」。

十一月十五日，代表汪精衛和日本勾結的梅思平、高宗武，在日本東京，和代表日本的今井武夫、影佐禎作，簽訂了一項「中日邦交新案」；作為以汪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進行和平停戰的準據。

次日，汪與蔣公進餐後，又激動的老調重彈的要求蔣公：「使中國陷於現在情形，乃國民黨的責任，所以爾我二人，應一同辭職，以謝天下

。」蔣公反駁他：「辭職以示負責，說來極為容易；可是誰來負責救國？」

不久，梅思平到了重慶將和日本勾結簽訂密約的經過，報告汪；並說明日本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談判和平。於是，汪在其寓所，召集黨羽會商多次，不能決定。但由於陳璧君的堅持快走，而日方又一再祕密催促，汪才決定出走。

出走的目的地是越南，第一個策動參加「和平」的有實力對象是雲南的龍雲。於是，由陳璧君先密赴昆明，游說龍雲。龍雲對陳表示：很同情汪氏為國犧牲精神，如果要取道雲南出國，他願負責其安全，並給予相當便利。

於是，汪等乘蔣公一次離渝出巡的機會，由汪電話交通部長彭學沛（為汪系人物）預留赴昆明機票；潛往昆明，與龍雲談得很投機。但龍對公開響應他「和平運動」一點，未能立即表明贊同態度。汪遂在龍派人妥為保護下，於是年十二月廿一日抵達河內。

汪剛到河內，第二天日本政府即發表「近衛三原則」，提出「東亞新秩序」；好讓汪用為根據，對國內發動「和平運動」。汪乃于十二月廿九日發表他響應「近衛三原則」的「艷電」。

汪出走之事，雖報上未予刊露，但市上已有傳聞。十二月廿六日，蔣公尚在 國父紀念週會報告，汪係赴河內養病，將轉赴國外；各報對汪也未攻擊；大家都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不為己甚；希望他勿背叛國家，自毀令名。可是當他「艷電」發表後，人人對他失望；中央為穩固民心，

堅守立場，不得不于民國廿八年元旦召開中常會，決議開除汪的國民黨籍，政府也下令通緝。

黨政雙方，雖對汪有嚴厲的處分；但仍希望他勿受敵人愚弄，鑄成大錯。曾經兩度派人赴河內多所規勸，並且送去汪等出國護照與一筆為數可觀的旅費。

可是，汪表面上雖說擺出接受護照旅費，準備赴歐，請中央諒解的姿態；但實際上却加緊與雲南龍雲聯繫，函促龍趕快佈置，宣佈響應他的「和平運動」；同意他回到昆明，將「艷電」主張，付諸實際行動。此一密謀，被戴雨農的情報人員偵查到確證；為了確保國家安全，伸正國法，才有誤中副車，殺死曾仲鳴之事。

汪精衛好衝動的個性，陳璧君竭力的慫恿；再加日敵的誘惑；汪等一行，終於四月廿五日，在日本特務人員的設計與掩護下，潛赴上海，步上投敵叛國的厲階。

漢奸難為，自食苦果

汪等赴上海以後，前往日本，自六月十日開始，分別訪問平沼內閣，前首相近衛，及軍部要人板垣，米內等人，以探獲日本對今後中國新政權合作的真意；才知道日本軍部與「興亞院」的真正意旨，是使汪建立一個與「滿州國」相似的傀儡政權，一面用以分化中國抗戰陣營，一面貫徹其蠶食中國的國策；而非如汪所想像的「統一華夏」的「中央政權」。汪雖仍想親晤日皇，但被日人以日皇「不親過問外交」為由，予以拒絕。

汪返滬以後，于七月十四日，以「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為題，發表演說，批評中國抗戰為以卵擊石；主張冤仇宜解不宜結，鼓勵同情之士，共謀和平，並作為新政權的第一聲。

八月廿八日，汪在上海愚園路召開國民黨的「第六次全代大會」，廢除「總裁制」，推他為「中央執委會主席」；並且電召各地黨委赴滬報到；先從黨的方面，另起爐灶。

九月廿日，汪再在南京約見當時華北偽「聯合政府」的首領王克敏，以及南京偽「維新政府」的首領梁鴻志；會商合併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事，毫無結果。因為三方面的真正的實際支持「者，均為日軍的特務機關；梁為原田機關，王為喜多機關，汪為影佐機關，而此三機關並無直接隸屬關係。所以王、梁不能作肯定答覆，而把事實上的可否，推到日本特務機關去。事實證明，日本人的對汪估價，與王、梁相等；縱然表面上將來或許有一「中央政府」出現；但事實上南北必然仍為各行其是，絲毫不能發生「統一」作用的局面。這與汪的權勢愈，領袖愈，以及「抱負作為」；有了很大的差距。因此，雖說汪表面上忙「組府」，很積極；但實際上他的內心，已開始矛盾，嚐到苦果的滋味了。

十一月，日方為了達成利用汪的真正目的；以積極支持汪「組府」為條件，促使汪派代表在江灣六三花園，就「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舉行連續七天的會談。這一「要綱」，大藍圖為德、義、蘇、日四國瓜分世界；蘇、日兩國瓜分中國。小藍圖則把中國的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和

海南島劃分為五種「地帶」：也可以說是五層。最深的一層是「滿洲國」，第二層是偽「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而海南島和台灣一樣是日軍的基地。

當汪最初聽到「要綱」的內容時，知道上當，當即一面流淚一面憤慨的表示不能簽此「賣國契」。並且曾有遷往法租界，停止一切活動的意圖；但迅即被影佐所知，一面假裝同情汪的處境，答應回東京報告近衛，干涉此「要綱」；一面却暗中加強對汪等的監視，使他移居的計劃，無法實現。

影佐由東京返滬，「要綱」仍然要談判；又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會議，祇略作修正；最後終於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廿一日簽字。汪終於在為他自己所形容的「賣國契」上簽了字，留下永遠無法磨滅的漢奸烙印！

可是，此一「要綱」密約，却被人揭發而公諸報端，成為轟動世界的大新聞；不但國民政府為之發表「告全國軍民書」及「告友邦人士書」，嚴斥荒謬；即淪陷區一般民衆，對汪的真正面目，也因此而明白瞭解。起初所謂「與中央唱雙簧」的論調，也就不攻自破了。

汪的「賣國契」簽過了，日本人當然要支持他「組府」；於是在民國廿九年三月卅日，汪的偽政府成立了，原來南京的「維新政府」

當然取消合併；華北的偽政權，名義上也合併到汪的政府之內；但實際上，還是惟日軍特務機關之命是聽。汪的偽政權，仍然用中華民國的年號，居然稱為「還都」，遙奉林森為主席，汪自封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長，軍委會委員長。（好像因他還都，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自然就不存在了，真是荒唐）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但加一黃色三角形飄帶，上書：「和平、反共、建國」；以示區別；並準備必要時隨便取消此帶，回復原來面目。凡此種種作為，都表示他是繼承法統的正統，不是劉豫、張邦昌。

其實，這一「正統」，除開國家的獨立主權不談；僅就其號令管轄所及，也僥倖得很，簡直不成氣候。當時有一上海人，曾撰一聯譏嘲汪偽云：

「陳公博兼選特簡荐委，五官俱備。」



叛國降敵組織偽政府沐猴而冠的汪精衛。

汪精衛有蘇浙皖鄂粵，一省不全。」

雖說語意滑稽，但也事實如此。（陳公博以立法院長、兼軍委會政治部長、上海市長、第八區區長；上自院長而下至區長，一人兼任，亦聞所未聞。）

日本所謂尊重中國主權，本來是騙人；而汪精衛向敵人所開：「可招致軍隊與黨員來歸，促進全面和平」的支票，也無法兌現。以蔣公所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為中心的抗戰陣營，並未受到汪「組府」的影響；組織仍然堅強，戰志仍然昂揚。當日軍因戰事膠着越想早日和平結束時，越對汪失望；於是逐漸對汪禮儀疏傲。自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中美英蘇結成同盟陣線；在日人的眼中，汪的偽政權，反而成為中日和平的障礙。於是時常給汪以無法忍受的侮辱。汪雖懊惱，恨敵入骨，甚至因此寢食不安；但既入牢籠，欲想再師故智，來一次負氣出走，已不可能；而且也沒有路可走了。

民國卅一年五月，汪承敵人之命，不得不訪問僑滿。同一傀儡的傳儀，居然擺起「帝王之尊」的架子，不以「友邦元首」之禮對待汪；使汪感到憤憤不平。民國卅二年，敵人再逼汪以「中國」名義，對英美宣戰；雖說他以為此事與他「和平、建國」的宗旨不合，但又不敢不依。

漢奸難為，自此以後，汪的舊病復發，不再有任何政治活動，也不再發言自欺欺人的言論了；而成為無聲無臭的傀儡。因為他病急亂投醫，於是又給愛國志士鋤奸正法的機會；終於使他以骨髓發炎的絕症，于民國卅二年十一月客死日本。

蓋棺論定，最大悲劇

綜觀汪精衛的一生，真是非比尋常；終身處於時代激流之中，充當要角。雖說他不遑寧處，很少有安定頤養的機會；雖說他大開大合，常常成為風雲人物。可是，除了行刺滿清攝政王一事表現，可以比美先烈，毫無愧色外；其餘事蹟；初則以革命志士而勾結老奸巨滑的袁世凱，後來再受俄共利用，製造黨的分裂；再「驅共倒蔣」，「聯蔣反蔣」。種種奇怪陸離的政潮，都因為他的不甘寂寞推波助瀾而層出不窮。他也曾身居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長的高位，領導黨國；可是，却因為他那反覆無常的個性，從不能與任何人合作到底，甚至動輒負氣出走的事實；而未能好好把握運用，發揮一己的才華，為黨國多所靖獻。反而使人感覺他是一個無一貫主張，無明確目標，無真正思想，無一定是非的怪角。

論才華，他有翩翩動人的風度，富有煽動性的口才，優美流暢的文筆。如果終身從事教育文化事業，他的成就，可能不在胡適等人之下；如果從事文藝寫作，他也可以成為文壇名流；凡此，都可以使他揚名當世，甚至在歷史上留下光輝的記載。可惜他却熱中於黨政工作。

從事黨政工作，必需氣度恢宏，言行一致；國父與蔣公即因此開創事業成為偉大人物，受人崇敬。可是汪精衛的氣度的狹窄，迥異常人；竟然以他早年同生死共患難的摯友胡漢民，作為排擠的首一目標；難怪胡深鄙其為人，而和他分道揚鏢了。汪的言論，的確具有吸引人的魔力，甚

至有人推崇他是「民主的偶像」；可是當大家發現他言行並不一致之後，都瞭解他之所以貌恭言順，聳人聽聞；祇是一種「盜名欺世」的伎倆而已。因此，他雖然擁有一部份黨徒，但却不能得到普遍而持久的擁戴。

汪以存之於內的「私」，與形諸於外的「偽」，在黨政事業上旅進旅退，無法鞏固其領袖羣倫的地位，而其領導慾與支配慾又特別強烈，於是，惟「力」是趨。誰有力量，就結交誰，利用誰。最後，他看中了敵人的力量，想利用敵人；但却反被敵人利用，使他成為在歷史舞台上連秦檜都不如的丑；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以汪的才華資歷，不死於行刺攝政王之役，成為革命烈士；不懸崖勒馬於逃抵河內之後，悠游歲月於海外；竟一意孤行，在敵人羽翼下，組府叛國；而成為國人皆可殺的漢奸國賊，成為敵人視為鷄肋的傀儡，客死敵國。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不但是汪精衛個人的悲劇，而且也是時代悲劇。（全文完）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穿線平裝
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
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
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
陸元）